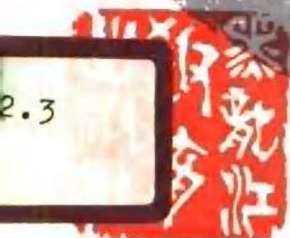


戴志钧 著

论 猪 二 集



I222.3
63
3

论骚二集

BH66115



戴志钧 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B 735555



论骚二集

戴志钧 著

责任编辑：曲子玮

封面设计：安振家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（哈尔滨市道里九站街·1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 6·插页 2·字数 141千

1990年11月第1版·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ISBN 7-5316-1124-4/Z·3

定价：3.20元

序

戴志钧同志治屈赋之学，卓有成就。其所著《读骚十论》刊行以来，为学术界所重视。近又以数年之努力，写出《论骚二集》，即将问世。

两书相较，后者更为深广。这因为在前书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，必然会获得更大的收获，只要就书中各篇的标题即可窥见大概。约略言之：前五篇有关刘安、司马迁、刘勰、朱熹（两篇）等对屈赋研究的贡献（王逸和洪兴祖的两篇也在计划撰写之列），给以科学的总结，这是前人和近人都没有能充分做到的。

后五篇除桔颂、抽思的论析可补前书之所未备外，如《论“离骚”的形象体系和抒情层次》、《也谈“离骚”的整体结构和求女、问卜、降神问题》、《屈骚意象、手法、风格》等三篇，则是以近代的科学知识和理论为依据，对于屈赋之中的复杂问题进行剖析，考论精详，多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深与广是互相推进的。知识面之广，就有可能通过抉择、提炼而推进探讨的深度。探讨得深，就有可能更感到对学识广的需

要以及对广的质量的更高要求。因此，我们既可以从广中体会到钻研之深，也可以从深中体会到含蕴之广。而要体现这一点，就不是浮泛和粗疏的功力所能办到的。

志钧同志用志不分，知难而进，而又能持之以恒。每一篇的构思，都能在博稽众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因此，每作一篇就有一篇的收获。积之既久，触类旁通，形成自己对屈赋的系统见解，从而对屈赋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，都能分别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。这就不仅是志钧同志个人的精进不已的收获，而且也必然是屈赋之学的可喜发展。

我和志钧同志共事三十余年，同以多病之身，互相策励，而治学态度又有许多近似之处，故深知其中甘苦。我于屈赋之学，无能为役，谨就“广”、“深”二义，提出自己的初步体会，读者根据本书的内容去推求验证，当知余言之不谬也！

张志岳时年八十

1990年4月14日

目 录

序.....	张志岳
《离骚传》存留文字考辨.....	（ 1 ）
略论司马迁在屈原研究上的奠基作用.....	（ 11 ）
论刘勰的《楚辞》学说.....	（ 23 ）
论朱熹在《楚辞》学史上的开拓性贡献.....	（ 43 ）
论朱熹《楚辞》学说得失根由.....	（ 67 ）
论《离骚》的形象体系和抒情层次.....	（ 91 ）
也谈《离骚》的整体结构和求女、问卜、降神问题.....	（ 112 ）
《桔颂》三题.....	（ 126 ）
忧伤幽怨，无可告诉.....	（ 142 ）
——《九章·抽思》赏析	
屈骚意象·手法·风格.....	（ 153 ）
——屈原艺术个性研究	
后记.....	（ 133 ）

《离骚传》存留文字考辨

从现有文献来看，淮南王安是最早的楚辞评论者。因而，他的《离骚传》在楚辞学史上便具有开山的作用^①。古今学者多有称引。不过，一些学者的征引缺乏确凿的文献根据，已经引起了混乱。那么，《离骚传》到底存留了多少文字可作征引，有加以考辨的必要。

(1) 董份说：

此传（按指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大概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屈原作者也。太史公全用此语，班固尝有论矣。（录自凌氏《史记评林》卷八四）

(2) 章太炎说：

“《楚辞》传本非一，然淮南王安为《离骚传》，则定本出于淮南。”又说：“孟坚序引淮南《离骚传》文，与《屈原列传》正同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。”（《检论》）

(3) 朱季海说：

《史记》之叙《离骚》，实取诸淮南王《离骚传》（观班孟坚

《序》、刘彦和《辨骚》引淮南云云可见)是以“离骚”为遭忧，自淮南王、太史公以至班孟坚无异辞。(《楚辞解故》第3页)

(4) 游国恩说：

《史记》本传引淮南王说：“‘离骚’者，犹离忧也。”(《楚辞论文集》第258页)

(5) 蒋天枢说：

马迁著《屈原传》……其下文引刘安语，又云：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，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……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”则明言怀王已放逐屈原。(《楚辞论文集》128页)

(6) 聂石樵说：

淮南王刘安在其《离骚传序》中论述屈原的创作意图说：

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

淮南刘安又说：

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原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”

淮南王刘安在《离骚传序》中论述《离骚》的内容说：

“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”(均见《文史知识》1983年第9期，《关于屈原三题》)

上引六例。前三例的共同特点是：都不是具体引证，而是整体推

测，同时，又都是以班固《离骚序》引淮南王安《离骚传》语为证。可是，班氏并未引《离骚传》全文（详后），那么，引者怎么可以据此来断定太史公《屈原列传》全用淮南王安语？又怎么可以得出《屈原列传》非太史公自纂的结论？又何以论定《史记》之叙《离骚》，实取诸淮南王《离骚传》？班氏引《离骚传》（总叙）只有51字。屈原本传叙述与《离骚》有关文字493字（不包括传赞），大约为班氏引文十倍。因此，上引三例，其论据都不能完全证明论点，其结论都似是而非。后三例都是具体引证。作者均将自己引文视为《屈原传》采淮南王安语，其实，都没有确凿文献根据，只是作者主观猜测。在《楚辞》研究中，类似这种引证颇多，已经贻误了读者，有澄清之必要。

二

（1）班固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：

时武帝方好艺文，以安属为诸父，辩博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。……初，安入朝，献所作《内篇》，新出，上爱秘之。使为《离骚传》，旦受诏，日食时上。

（2）班固《离骚序》：

昔在汉武，博览古文。淮南王叙《离骚传》，以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。蝉蜕浊秽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皎然泥而不滓；推此志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斯论似过其真。又说：五子以失家巷，谓五子胥也。及至羿、浇、少康、贰姚、有娥佚女，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，然犹未得其正也。

(3) 王逸《楚辞章句·叙》：

至于孝武帝，恢廓道训，使淮南王安作《离骚经章句》，则大义粲然。

(4) 荀悦《汉纪·孝武皇帝纪》：

上使安作《离骚赋》，旦受诏，食时毕。

(5) 高诱《淮南子·叙》：

初，安为辨达，善属文。皇帝为从父，数上书，召见，孝文皇帝甚重之。诏使为《离骚赋》，自旦受诏，日早食已。上爱而秘之。

(6) 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：

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。

《神思》又说：

淮南崇朝而赋骚。

(7) 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

始汉武帝命淮南为之章句，旦受诏，食时而奏之。其书今亡。

上引七条材料，既可互相参证，而使某些一致意见得以定论；又由于互有抵牾，引起聚讼纷纭，迄无定论。班固两言淮南王安作《离骚传》；王逸则说刘安作《离骚经章句》；荀悦、高诱又称安作《离骚赋》；刘勰既言“淮南作传”，又言“赋骚”。那么，《离骚传》、《离骚经章句》、《离骚赋》，三者指的是一回事呢？抑或为三？这曾引起古今学者不同议论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明确，上引七

条材料的史料价值不是相等的。其中，班固两条材料，来源最早，最直接，又最具体，因而其价值则最高。荀悦言《离骚赋》，乃《离骚传》之别称（详下），顾炎武曾说：《汉纪》“间或首尾不备，其小有不同，皆以班书为长”（《日知录》）。《汉记》本以《汉书》为据。《淮南子·叙》说法大体与《汉书》相同。可是高诱明显把朝代搞错了。依《汉书》淮南王安本传判断，“孝文”当是“孝武”之误。由于这一错误导致将《汉书》本传“安属为诸父”改为“皇帝为从父”方使世系合理。考之《汉书》，刘安招揽门客著书立说，是在“武帝”朝，而绝不在“文帝”朝。高诱所述，既采用了《汉书》淮南王安本传，又误改了它，其史料价值当然不能同《汉书》相比。至于刘勰既言“作传”，又称“赋骚”，又作何解？其实，刘勰所言“作传”、“赋骚”本为一义，“作”、“赋”均为动词。“赋骚”即是作《离骚传》之意。由于采用特殊文体句式的特殊要求，便用“赋骚”，而不能用“作骚”。如果用“作骚”则要发生误解了。考之《辨骚》篇可知，刘勰是本于班固的。王逸所谓“使淮南王安作《离骚经章句》”云云。从班氏《离骚序》来看，淮南王安于《离骚》不但有总体评论（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……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）而且还有文字训释。其谓“五子以失家巷，谓五子胥也，及至羿、浇、少康、贰姚、有娥佚女，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，然犹未得其正也。”便是明证。王氏所称《章句》，则是侧重于训诂名物角度而言。从班氏《离骚序》上下文意的联系来看，他所说的《离骚传》同王逸所称《离骚经章句》其实是一回事。《离骚经章句》当不是淮南王安自己的命名，而是王逸的称谓。颜师古《汉书》“《离骚传》”注云：“传，谓解说之，若《毛诗传》。”这解释是正确的。淮南王安的《离骚传》全文则应包括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总叙，一部分是注文，而王逸则侧重于从注文角度称，则名曰《离骚经章句》。班固去刘安未远，他不但亲眼见过《离骚传》原文，也有可能看到武帝命淮南王作《离骚传》之《诏》。班固、

荀悦、高诱，他们或言“旦受诏，日食时上”，或言“旦受诏，食时毕”，或言“自旦受诏，日早食已。”所言时间完全一致。从“受诏”到呈上《离骚传》不过两三个时辰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呈上《离骚传》，大概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对《离骚》作极简单的提示，一是早有《离骚》注解，诏令下来，稍加整理便呈上。《史记》本传云：“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，不喜弋猎狗马驰骋。”《汉书》本传又云：“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众。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。时武帝方好艺文（余见前引）……。”他既“好读书鼓琴”，又“辩博善为文辞”。去楚未远，其都城为楚故地，遗留楚文化一定很丰富。现有材料已经证明，他确实是一位楚辞专家。因此，他早就对《离骚》作出注解，是可能的。或许武帝早已了解了这一点，才要得那么急。大概淮南王安接到诏令后，把已有的《离骚》注解加以整理，又重新对《离骚》旨义加以概括，一并呈上。这就是班固所说的《离骚传》了。关于《离骚》总叙部分，是接到诏令以后临时作的，是对《离骚》旨义的敷陈。荀悦、高诱单指这一部分而言，便称作《离骚赋》。或许这就是他们称作《离骚赋》的原由。《释名》云：“‘赋’，敷也，敷布其义谓之赋。”蒋天枢先生说：《离骚赋》的“‘赋’字仅用其‘敷陈’之义，非以‘赋’为文体^②”，所言甚当。如果上面的分析推论不错的話，那么，为什么会有《离骚传》、《离骚经章句》和《离骚赋》之名的問題也就解决了。尽管称谓的着眼点和内容范围不尽相同，实则异名而一实。而《离骚传》一名，则可以概括《离骚经章句》和《离骚赋》，它才是刘安所上呈武帝著作之原名。

三

本文所要考辨的《离骚传》存留的文字，是指关于《离骚》总叙

的评论文字。本文第2节第2例班固《离骚序》言：“淮南王叙《离骚传》，以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……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紧接下去的“斯论似过其真”是班氏的评语，前面的“以”字是班氏引文过渡语。其间51字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篇引《离骚传》文字除两处异文（班氏引文“泥”，刘文作“涅”；班氏引文“滓”，刘文作“缁”）和少“推此志”3个字，其余与班氏《序》引文全同。可以认为刘氏本自班固，而班氏所引《离骚传》的51字，就是根据文献所能指实断定存留的《离骚传》关于《离骚》总叙的文字。班氏引文，见诸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（文字小有异）。《屈原列传》中没有交代引刘安语，而是后世学者根据班氏《离骚序》而断定《史记》屈原本传引了淮南王安《离骚传》语。于是便出现一桩公案：是司马迁在《屈原列传》中采用了淮南王安语？抑或是后人将淮南王安语窜入《屈原列传》的？当代学者汤炳正先生论定司马迁没有见过淮南王安的《离骚传》，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引《离骚传》文字，是后人窜入《屈原列传》中的。他有翔实的考论^③，其说有相当道理。

关于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，古今学者从内容、结构、文气等方面提出过一些怀疑，涉及问题相当复杂。仅从《楚辞》研究方面来说，如有的学者主张，自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……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，“当是淮南王《离骚传》中语，史公录用之者也。班固序节之。亦见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篇。”这段文字144字（据《中华书局》标点本，下同）接近班氏《序》引文三倍。还有的学者则说：“就今本《屈原列传》而言，由‘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……’到‘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’，由‘虽放流，……’到‘岂足福哉’这两段文字，都是后人割取《离骚传》语窜入本传者。”这两段文字，前一段237字，后一段205字，共计442字。以上两种说法均有相当理由，尤其后者作了详细的分析推论，颇有说服力。这些意见都能给读者很大启发。可是，这些看法，一时还难以成为定论。因为只是分析和推论，而

并无实证。从他们的看法来说，有它的道理，可是从相反方面提出一些问题，也有相当理由。就前面一种意见来说，为什么是司马迁“录用”了自“《国风》……争光可也”而“班固序节之”，而不是司马迁当初在“录用”时便穿插在自己文章中的呢？即是说，班氏所引为《离骚传》原文，而不是司马迁引了刘安原文班氏《序》又加以节引。或如汤先生所言，司马迁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刘安的《离骚传》，而是后世学者根据班氏《序》引《离骚传》之文字而窜入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的。再就后面一种意见来说，在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“剔除”作者认为后人窜入的两大段（见前），并认为这两段文字便是《离骚传》原文之全文。这样也就解决了作者所说的“未被窜乱的《屈原列传》和未被割裂的《离骚传》，皆条理明晰，毫无矛盾。浅人窜乱，乃成疑案。所谓离之则双美，合之则两伤。”似乎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可是，也还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。按这种主张拟意恢复的《离骚传》前一部分，表面来看浑然一体，仔细推敲起来，观点存在矛盾。从“离骚者”至“盖自怨生也。”这里肯定屈原作《离骚》是正义的呼喊，对人间不平的抗争，字里行间强调了“怨”得合理。表达的是一种异端的文艺思想。而下文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”，则强调的是“不淫”“不乱”，表达的是“怨而不怒”正统的文艺观，两者大相逕庭。前者符合司马迁的文艺思想，后者则是刘安的文艺观点。如果是出之于一人之手是不当有牴牾的。况且前者那种愤懑不平之气，恐怕也不是刘安之徒所能有的。此其一。后一段“……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”，字里行间有作者的寄情抒愤。考淮南王安是主动谋反，很难有这种感情。此其二。如果把上指两段文字从《屈原列传》中“剔除”，那么，司马迁的《屈原列传》正文叙述到同《离骚》有关的文字只有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

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而在结尾“太史公曰”又特别强调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”屈原之“志”，屈原之“为人”，在《离骚》中表现最为充分，司马迁比谁都清楚。最使司马迁受感动并促使他为之立传的当然是《离骚》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作辞以讽谏，连类以争议，《离骚》有之，作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第二十四。”又言“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。”《报任安书》中又说：“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。”《离骚》之于屈原的意义，司马迁真可谓体会到了极致。然而，他在本传中引述了《渔父》，又全文引录了《怀沙》，对于《离骚》，如果竟只提上引一句而不加评论，这是不可理解的。此其三。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……作《离骚》。”与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内容连接十分紧密，不可分割。况且，“屈平正道直行……盖自怨生也”，是从“屈平疾王……作《离骚》”来的，一脉相承，气如贯珠。怎么可以断定一方面是司马迁所言，而另一方面则是刘安所语？此其四。古今学者都不否认，司马迁常常借他所传之人物寄情抒愤。他心中郁勃不平，行文便起伏跌宕。而《屈原列传》则是显例。明赵南星《离骚经订注》之《自序》云：

屈子以神妙殊绝之才，处郁邑无聊之极，肆为文章，以骋志荡怀，出入古今，翱翔云雾，恍惚杳茫，变化无端，匪常情之攸测，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。实自剖泮以来，所未有之文也。司马子长天才侔于屈子，而愤世疾俗，异代一揆。故为之立传。叙次其事，才及数行，不胜怆惘，辄为论议，又复叙次，未几复论议焉。且泣且诉，且唱且叹。子长以前作史者，无此体也。要之世有屈子，乃能为《离骚》。为屈子传，必以子长之文。亦惟子长乃能传屈子耳！

这大体可以回答有人提出《屈原列传》“文理龃龉”的问题。况且，姜先生已从错简方面作了推测和拟意调整，并且又承认“突兀不次，此盖古人文法未甚缜密之处。”④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。造成这种现象也同上文所言作者感情激越不平有关系。此其五。上举五端，针对主张从《屈原列传》中“剔除”两大段文字而全部归属于《离骚传》的意见相反方面提出一些问题，目的不是要推翻那种颇有建树的见解和严密的分析论证。这种意见是有启发意义的。为继续解决《屈原列传》疑难问题打开了一条通路，可以作为深入探讨进而得出定论的一个重要步骤。可是，要想使这些意见作为定论，还需要找到实证，光靠分析和推论还难以成为定论。因此，我以为是不能将前指两大段文字（共 442 字）都当作淮南王安的《离骚传》的原文加以引证的。当然，完全有理由说，淮南王安《离骚传》总叙的全文，不只是班固《离骚序》所引的 51 字。它会对《离骚》的内容、形式有更全面的评论，也有可能涉及屈原生平事迹。可是，从现有文献来看，今天所能确定《离骚传》（总叙）存留文字，只有班氏《序》引的 51 字。其它种种推论，只能是为深入探讨提供一种假说。而这种假说在没有发现实证之前，是不能作为定论来征引的。而本文第一节所举六家引文（这种征引颇多）都超出了班氏引证的范围，我以为是不妥当的。

一九八九年二月

〔注释〕

- ① 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早于《离骚传》，赋中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和崇敬，然而它是借写屈原不幸遭遇而抒发作者感愤，不属评论文字。
- ② 《论〈楚辞章句〉》，见所著《楚辞论文集》。
- ③ 《屈赋新探》。
- ④ 《史记屈原列传疏证》，见所著《楚辞学论文集》。

略论司马迁在屈原 研究上的奠基作用

在中国悠久优秀的文学传统里，“楚辞”、“唐诗”、“宋词”、“元曲”、“明清小说”这些芬芳艳丽的奇花异葩，各自代表着一种文学体制或表现一个时代的主要文学风貌，它们各自都以最杰出的作家为代表。可以说各自如果失去了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会大为逊色。即使如此，在“唐诗”、“宋词”、“元曲”、“明清小说”中，如果分别失去李、杜、苏、辛、关、曹，还不能说没有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样式。然而，在“楚辞”中，如果抽掉屈原及其作品，恐怕它就难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屈原在“楚辞”中确实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。那末，关于“楚辞”的研究，就不能不以屈原研究为基础了，而司马迁对屈原生平事迹和创作的叙述评论，则为屈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从楚辞学史的角度来看，他确实起到了奠基作用。

屈原的诗篇是用他生命谱写成的悲愤的歌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赞曰：